

專 號

1950 年代的海峽兩岸

導 言

陳永發*

海峽兩岸在 1950 年分治以後，各自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另一條是「資本主義」。這個黑白對比，在毛澤東執政的二十六年尤其明顯，但是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已漸趨模糊，以至於今天我們大可以爭論中國大陸究竟仍姓社會主義，或已改姓資本主義。其實臺灣即便是公認的資本主義天堂，其國營（一度包括黨營）經濟的龐大，也曾經令人懷疑名實是否相符？最近中國大陸一心要建立市場經濟的體制，而臺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的社會主義性格，卻比大陸的醫療保險制度，更加明顯，也因而招致某些自由派經濟學者的質疑：臺灣到底是不是開始向社會主義的福利國家轉變？這些懷疑或許只是名詞之爭，但是海峽兩岸經過五十年的變化以後，其間差別之明顯仍然有目共睹，臺灣實行多黨政治，而中國大陸仍堅持一黨專政；臺灣中小企業發達，中國大陸則有相當規模的鄉鎮集體經濟；臺灣言論自由氾濫，而中國大陸則迄今文網仍然嚴密。

海峽兩岸這些差別究竟如何造成？要回答這一個問題，當然要回到 1950 年代。當時，海峽兩岸都剛建立新的中央政權，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中正則把中華民國的首都撤退到臺北，並宣布重行視事。一個政府如旭日東昇，充滿生機；另一個政府則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三、四十年後，河東變成河西，河西變成河東。中國大陸雖然在軍事方面成爲亞洲超強，卻仍然是世界平均個人所得最低的國家之一；臺灣雖然在經濟方面躋身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並在政治上被譽爲亞非國家民主化（開放黨禁和報禁）的模範，但是面臨國家認同和經濟轉型的兩大挑戰，又不知珍惜既有成就，結果原來在海峽兩岸的和平競爭中擁有的優勢，已經開始消失。中國大陸急起直追，不僅沿海地帶的發展令人刮目相看，其知識分子對臺灣民主化的原有憧憬也隨而快速幻滅。雖然如此，回顧 1950 年代兩岸領導如何帶領人民走到今天，應該仍然具有特別意義。這是近史所爲什麼在 2002 年召開 1950 年代海峽兩岸會議的最重要原因。

1970 年代，中國近代史學界深受社會經濟結構決定論的影響，但是隨著對近現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感覺「人」的主觀因素被相對忽略。1950 年以後，無論社會經濟結構和歷史文化遺產兩個因素如何影響所謂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海峽兩岸的當政者都已根據各自的建國藍圖分別建設了一個不同於「傳統」的新「國家」。所以我們建議比較兩岸政治領袖對國際形勢、國內處境的不同認知，再分政治外交、思想文化和社會經濟三個方面進一步比較兩岸政府如何各自「型塑」其未來。具體一點說，我們想比較海峽兩岸的黨國體制，比較其如何紮根社會基層，比較其如何擴大政治參與，比較所謂白色恐怖（匪諜和臺獨）和所謂紅色恐怖（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壞分子）；比較國家如何對待文化和文藝，如何建立和改造教育體制，如何以意識形態型塑人民，以及比較國共兩黨如何對待宗教信仰、傳統禮俗和民間社團；比較如何繼承和改造社會經濟，比較和平的土地改革和暴力的土地革命，比較海峽兩岸政府如何發達國家資本，如何對待私營工商業主。通過這些比較研究，我們認爲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海峽兩岸的異同。那些是兩岸原有歷史的特殊性？那些是海峽兩岸求變之前的公分母？在變化過程中，有那些具體差異？差

異之外是否全無相似之處？

此一會議構想提出之初，我們就已經想到理想是否脫離了實際。海峽兩岸的歷史學者，過去受制於政治環境和史學偏見，均視 1949 年為不能跨越的史學鴻溝。現在臺灣雖然在政治上百無禁忌，但是能兼治海峽兩岸這一段歷史的同仁並不很多，就是專注一岸而研究有成的學者也屬鳳毛麟角。比較起來，中國大陸倒是從 1990 年代就開始提倡中國當代史研究，然而政治禁忌猶多，動輒得咎，學術成果也還不能說是成熟。臺灣既然連中國大陸的水平都趕不上，憑什麼想要進入更高層次的海峽兩岸比較研究呢？我們當時確實有此疑慮，但是認為立意雖高，只要肯從點滴做起，終究會有達到目標的一天。因此最後仍然決定不避好高騖遠之譏，召集了一次學術會議，希望先鼓勵本所同仁研究 1950 年代海峽兩岸的歷史，視其研究成果，再進一步研擬未來比較研究的議程。

這一次國際會議結束後，有三篇論文修改後投稿本集刊。本期配上另外兩篇性質相近的新稿，彙為此一專號。這五篇論文有其各自的關懷，因而有點缺乏共同語言，所以本刊編委會希望我撰寫一篇導言。我原來也認為這五篇論文除了時段相同以外，毫無其它交集，再次仔細閱讀和思考以後，卻發現它們所觸及的課題仍然可以從三個比較角度來進行討論。

第一個比較角度是：自 19 世紀末以來的國族主義如何影響海峽兩岸的外交？1950 年代的國際大環境是東西冷戰，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宣布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以俄為師，透過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和舉國投入韓戰，以爭取史達林的信賴和支持；當時，蔣中正的政府孤立無援，風雨飄搖，不料北朝鮮的金日成突然大舉南侵，美國為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展，宣布派第七艦隊「中立化」臺灣海峽，纔把惶惶人心安定下來。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中，海峽兩岸分別加入彼此勢同水火的東西方陣營，但是這並不表示它們都拋棄了 19 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觀念。其實，無論是領導冷戰的美蘇，或是被捲入冷戰格局的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是主權國家，也都從「民族國家」的立場思考各自的問題。張淑雅專攻中美關係史，她這一篇論文以一系列檔案研究為基礎，歸納 1950 年代美國對臺灣外交決策的過程，提出了迥異

美國學界主流說法的見解。她的論文清楚顯示，無論是杜魯門總統、還是艾森豪總統，或是其他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決策者，都不是表裡如一的「民主自由鬥士」，他們的最大關懷其實都是想像中的國家利益，總希望以最少的代價維持美國盟主地位；他們高舉反共的大旗，卻生怕蔣中正把美國捲入國共大戰，故不願痛快而乾脆地軍援蔣中正；直到 1954 年第一次臺海危機後，迫於形勢，纔同意與蔣中正簽訂正式的軍事協防條約。其實如果把注意力轉移到當時的中蘇關係上，我們會發現史達林對毛澤東同樣疑忌，不過害怕的倒不是被毛澤東捲入不必要的世界大戰，而是毛澤東共產主義信仰背後的中國民族主義。史達林要等到毛澤東出乎其意料之外地主動介入韓戰以後，纔放下對毛澤東的疑忌，主動擴大對中共的軍經援助。

梁鎮三是海外研究韓戰少數具有原創性成就的學者之一，並未參加我們的國際會議，這一篇文章是他研究韓戰的一個副產品，所處理的問題是韓戰期間中共和韓共之間曾經發生過什麼齟齬？再次清楚顯示 20 世紀擺脫不了民族國家本位的觀念。即使中國大陸和北朝鮮彼此都強調唇齒相依，是親密的社會主義盟邦，碰到攸關「國家利益」的問題時，也不免會有嚴重歧見，有時雙方爭執難下。其實，北朝鮮的金日成便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是史達林的傀儡，雖然高度依賴蘇聯軍經援助，卻不時從北朝鮮的角度堅持己見。當然，三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歧見，並未影響他們的敵愾同仇。然而，把北韓看成中共的傀儡，或把中共看成蘇聯的傀儡，就像把臺灣看成是美國的傀儡一樣，都是政治宣傳，距離歷史的真相甚遠。

第二個比較角度是：1950 以前的歷史如何影響海峽兩岸的政治？晚清以來，中央政府都一直設法把政治權力直接伸展到社會基層。蔣中正的國民政府也繼續此一趨勢，曾經力圖把統治機制伸入社會基層，以便控制動盪的人口和汲取民間的資源。國民政府接收的臺灣，人口 600 萬，土地 36,000 平方公里，加上日本留下來的警察和戶籍制度，比較容易統治。中國大陸的人口是臺灣的 90 幾倍，土地是臺灣的 260 餘倍，中共爲了紮根社會基層，不斷掀起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以便形成黨（支部）、政（基層政府）、軍（民兵）、民（群眾團體）一體的基層組織。不過，由於在此過程中，

這一個基層組織不斷提拔社會邊緣階層的積極分子，充當幹部，所以表現得比國民黨的地方保甲更加具有向心力。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對照海峽兩岸對其政令的宣傳和推行的過程時，會立即發現共產黨遠比國民黨有效率。余敏玲原來研究 1920 年代的中蘇文化關係，曾以〈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一文參加我們的會議，但是這裡刊登的卻是她的另外一篇文章，主旨在探討中共如何在中國大陸人民心目中建立或改造蘇聯形象。她最初的視野集中在所謂民間團體的中蘇友好協會，經深入研究以後發現，中蘇友好協會其實是中共密切控制的宣傳機器，其所以能夠造成巨大聲勢和政治壓力，實有賴於各級政府組織的密切配合，基層幹部的響應尤其重要，因此能夠徹底改變中國人原來對蘇聯的漠視或仇視心理。

其實把政權組織深植到社會基層，多少反映中國古代的編戶齊民傳統。帝制時期，每當新朝代出現以後，總是清丈土地、整理戶籍，徹底掌握人口和土地，以便據以課徵稅收。及至王朝末期，國庫空虛，又有種種臨時需要，於是實行攤派，由各級政府把需要逐層攤派到社會大眾。攤派不限於金錢，也包括其他政府需要的物資。這種攤派，到晚清出現新的因素，因為要建構民族國家，故政府藉口開民智攤派書報。1902 年，山西省創辦《晉報》，即指示各縣訂購 30 份，到 1908 年增加為 100 份。辛亥革命後，閻錫山繼承這一個傳統。¹國民黨北伐成功，並未廢止攤派，但是它似乎不曾在農村攤派書報。箇中原因應該不是對私有財產權的尊重，蓋非有所不為，乃勢所不能也。黎漢基原來專治近代學術思想史，他這一篇論文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的初試啼聲，從中可以看到，中共不僅繼承攤派書報的傳統，而且發揚光大，尤其因為其基層組織的強力配合，而經常淪為擾民之舉，以致中央官員不得不要求反省檢討。其實，中共建國初期的攤派，不限於書報，還包括捐獻和稅額。不過，由於建立深入基層的新官僚體系，又懂得群眾動員，所以無論效率或規模都不是國民政府所可以相提

¹ Henrietta Harrison, "Newspapers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29," in Jeffrey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93-98.

並論。雖然如此，中共強迫攤派仍然造成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人民抱怨連連。如果黎漢基在強調中共重點發行和強迫攤派的弊病之餘，進而比較國共兩黨的措施，就可能發現，中共在杜絕中飽方面相當成功，而其幹部的熱誠和奉獻也多少減輕了人民對攤派的抗拒。

第三個比較角度是：意識形態在海峽兩岸經濟轉型過程中發揮過什麼作用？1950年代，海峽兩岸分別大力爭取美蘇兩強的友誼和援助，但是毛澤東的對蘇聯一邊倒政策和蔣中正強調中美傳統友誼的作法究竟有所不同。毛澤東強調以俄為師，要求全方位的向蘇聯學習，所以總結蘇聯十月革命和史達林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即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一度成為每個幹部學習的聖經，以便中國儘快迎頭趕上。蔣中正不曾提出以美為師的口號，非但沒有類似《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的指定讀物，更沒有動員舉國上下全方位學習；反而政治上以堅持威權主義統治為前提，經濟上以揭糞孫中山三民主義為旗幟，相當被動地學習美國文化和制度。毛澤東移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實現了蔣中正1930年代建立基本國防工業和重工業體系的夢想；然而退出中國大陸的蔣中正偏處在臺灣海島，卻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重建和訓練強大軍事力量方面，期望有朝一日能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援而反攻大陸。

值得深思的是，中共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尤其崇拜史達林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然建國之初，卻不學習蘇聯十月革命，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反而賡續前國民政府的經濟格局，高舉建立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大旗，實行混合經濟，承認資本家、小商人都在社會上有其存在的正當性，主張國營經濟和私營經濟共存共榮。相對之下，臺灣當時沒有像樣的私營企業，國營和公營企業幾乎一統天下，比起中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可以說更具有社會主義的性格。然而中共以國家力量協助大部分私人企業恢復景氣以後，卻在1953年以後宣布全國將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徹底消滅個人企業。臺灣則是繼承孫中山混合經濟的立場，同時為了順應美國的盼望，努力發展私人中小企業。

中共在1953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隨後又實行重要農產品統購

統銷，逐步把所有私有企業納入計畫經濟體制。很多學者認為中共施政如果停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中國人民或可以避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金觀濤和劉青峰雖然不太同意，指出中共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但也強調中共之所以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不得不爾，因為中共實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階級，社會的糧食產銷結構隨而產生巨變，終於造成政府缺乏足夠糧食的危機。爲了渡過此一難關，只好實行統購統銷，由國家壟斷糧食購銷。李福鐘是臺灣大學博士班的學生，仔細比對中共所公布的資料後，下結論說，所謂危機並不存在，即便存在，解決之道也不是非統購統銷不可，仍然可以堅持新民主主義之路。只是毛澤東早就處心積慮要模倣史達林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其所以要在中國建國之初提倡新民主主義社會，反倒是因爲不得不爾，尋求權宜。當時中共國營經濟部門的產值只佔全國經濟的二到三成，若欲恢復八年抗戰前的經濟繁榮，除非仰賴產值更加龐大的私有經濟部門，將無以爲功。一旦劉少奇逾越分寸，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之類的口號，暗示新民主主義將垂諸久遠，毛澤東便立即予以嚴厲批判。其實，中共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協助私人企業本來就是有選擇性的，大力協助他們認爲「有利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卻不忘同時打擊他們認爲「不利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除以更大的精力「發達國家資本」、擴大國營經濟的規模和產值以外，更透過所謂協助掌控私營工商業的資金調度、原料來源和市場去向，以便有朝一日國營經濟部門可以挾持私有經濟部門向社會主義過渡；統購統銷就其原始構想來說，與其強調它是因應金、劉兩位所謂危機的不得已措施，不如強調它本來就是毛澤東在爲新民主主義社會創造向社會主義轉化的有利條件。換言之，毛澤東並沒有被土地革命帶來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牽著鼻子走，他從來不曾患上自己所冷嘲熱諷的「尾巴主義」之病。

李福鐘雖未觸及海峽兩岸的比較問題，但是令人想到另一個弔詭性的歷史發展：蔣中正一生篤信「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三民主義，而 1950 年代初期臺灣本來國有經濟高度發達，爲什麼型塑十年之後反倒變成以中小型私有企業爲主，高度依賴對資本主義國家輸出的開發中社會？

我們對三民主義中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性質似乎還有再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尤其應該研究當時主持經濟大政的技術官僚如何考慮經濟轉型？美國的經濟援助究竟在意識形態方面對臺灣產生過什麼影響？

以上簡短的討論，旨在顯示比較研究可能帶來的優越性。這種比較研究，因為樹立對立面，容易用來破除過去政治宣傳長期積澱在我們腦海深處的一些天經地義，也容易用來凸顯 1950 年代海峽兩岸在政治外交、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各方面的異同，從而釐清箇中文化傳統、意識形態信仰、社會經濟結構、菁英性格等各種因素所引起的特別作用，以便進一步掌握那些演變源自華人歷史文化的共同性？那些演變反映出兩岸社會各自的特殊性？不過比較歷史研究，若不對 1950 年代海峽兩岸各自歷史作深入理解，很容易流於膚淺。所以藉此機會再次呼籲同行們大膽跨越 1949 年這一條歷史鴻溝，加入開墾這一新領域的行列。同時也再次強調，歷史是有連續性的，若對 1950 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歷史不求甚解，這又和站在歷史的斷壁懸崖上面空想「通古今之變」有何差別？